

（二〇一九年十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上）	李清崑
【亡灵祭坛】	赵树理“文革”中遭毒打致死真相	赵魁元
【风雨欲来】	青春绽放在法西斯旗帜下	陶洛诵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四）	吴中杰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上）

• 李清崑 •

（本文根据《记忆》电子杂志访谈整理）

首先我要感谢电子杂志《记忆》启之诸位先生的采访，这就给了我对自己看法的机会。同时我也感谢高忆陵先生耗时费力，对我谈得较为零乱且有些事情说得也不够准确与妥当的谈话录音的认真整理。现在这篇文稿，就是在高先生整理的那份录音稿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充实、加工而写成的。

下面是我谈的主要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十年浩劫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以下不再加引号，包括“文革”），绝对绕不过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因为这张大字报一出台，就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和指挥者毛泽东的极端重视与大力支持，成为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的一个重要爆发点。

据经过中央审定批准出版的《毛泽东传》（下册）第1414页记载：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即1966年6月1日，身在杭州的毛泽东从《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写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了刊载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对该大字报极为重视，认为“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六月一日”

《毛泽东传》的编者注明：毛泽东的上述批示，见在《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写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的批语手稿。

更有甚者，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抛出的惊人之笔——《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把聂的大字报誉为“马列主义大字报”。该文劈头一句就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这就不仅把聂的大字报捧上了天，而且利用它作为在中央高层整肃刘少奇的“有效突破口。”

由此可见，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张大字报为什么会出台呢？是什么原因促使聂等七人在彼时彼地贴出这张大字报呢？为什么该大字报恰恰出现在北大哲学系而大字报的作者又都是该系的干部和教师呢？为什么七名作者有六名都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呢？为什么其中六人都参加了当年北京市委召开的长达七个月的“国际饭店会议”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最后一名作者虽未参加该会却是被批判者的同情者呢？为什么该大字报恰好出现在1966年5月25日而不是4月25日或5月15日呢？为什么该大字报贴出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极端重视并大加利用？显然，研究这张大字报出台的原因，不能毫无根据地主观妄断，也不能捕风捉影地加以演义，而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该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与剖析。这是我的基本主张。

前一阵子，有幸拜读了北大校友王复兴先生的大作《抢救记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出版）和长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初探》颇受启发。他在上述论著中，对大字报的产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文革后，有一种说法是康生夫人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此说法不实。”他用自己调查了解的情况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又提到：“彭佩云（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在2006年《百年潮》第02期发表了《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一文。该文认为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示炮制出来的。’”王复兴列举了彭佩云在文章中提出的三条立论证据，并进一步用自己调查了解的情况对彭的三条证据提出了质疑。最后写道：“结论：彭佩云的三个证据不能证明有人‘指使’。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曹轶欧或张恩慈曾找过大字报七名当事人或其中的三、四个人一起开过会，传达康生指示，要他们贴大字报，指示怎样写。既然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进行策划，那么，彭佩云所说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出来的’，‘炮制’一说从何而来呢？”

王复兴校友是学历史的，很重视收集事实材料。他在著作中列举了所调查了解的“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经过的资料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以上史实告诉我们，没有《五·一六》通知，就没有第一张大字报；没有‘国际饭店会议’就没有第一张大字报。《五·一六》通知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精神之下达以及北大‘国际饭店会议’中官民矛盾之激化，这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产生那张大字报，引爆文化大革命的两大要素。”他还写道：“笔者作为北大文革时期的学生，切身感到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是北大内部的小气候和全国大气候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

我认为王复兴校友得出的上述结论，尽管在用词上或许有不尽贴切之处，但总的来说颇有见地，大体上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对此，我基本上是认同的。但是，由于王复兴校友当年是北大历史系的在读学生，未参加过北大的反右派斗争，也未亲历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更未参加“国际饭店会议”，这一局限就有可能使他对当时的情况了解不够充分，

有些可能是第二手材料。他将文章题目定为《初探》，就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严谨态度和谦虚风格。

我是1948年7月在解放区加入华东大学的，一入学就身着军装，享受供给制待遇而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1949年2月参加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集训，同年4月22日随三野八兵团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并接管镇江市。在镇江、南京工作了七年之后，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1956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58年底留校任教，亲身经历了北大1957年反右派斗争及其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全程参加了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长达七个月的“国际饭店会议”。现在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了解的当时具体情况，谈谈我对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看法。在写作的过程中，从主观上说，虽力求所言有根有据，客观准确，但事情毕竟已过去了五、六十年，加之年迈体衰，记忆力大不如以前，有些记忆不一定准确甚至有误，有些看法也不一定妥当，甚至可能是谬言。错误和不妥之处，恐怕难免。敬请校友们和读者见谅，并望多多批评指正。

◇ 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产生的第一位的原因，即根本原因，是北大内部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所长期积累的多种矛盾不断叠加的产物，特别是北大社教运动之后长达七个月的“国际饭店会议”整肃社教积极分子致使矛盾更加尖锐化的产物。在这里，用“整肃”一词，不一定妥当，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来。不管怎么说，反正哲学系的社教积极分子尤其是其中的骨干人物是会议被批判的重要对象，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社教运动之前，北大内部的矛盾已日趋尖锐

陆平书记是1957年10月18日调来北大的。在他来北大之前，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反右派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彭真，已对时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江隆基在反右派时期的表现不满，认为他有右倾错误，未把老教授中所谓右派分子引出来。对此，彭真1965年6月2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北大社教运动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讲得很清楚。他说：“1957年反右派，教职员中右派没有好好放出来。学生中放得好，放出了谭天荣、叶于注。教授中右派没有放。当时校长是江隆基（校长是马寅初，江是副校长——笔者注），我当面和他讲过，他不愿放。我又写了一封信让宋硕同志亲自给他送去，他还是不放。实际上保留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一部分阵地，他们的思想还在起作用，一点一滴，潜移默化。”（见彭真讲话打印稿第7—8页）由于对江的不满，经中央批准派陆平来北大担任第一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降为第二书记。据陆平书记的女儿回忆，陆平来北大时一位中央领导同他谈话时说：如果你认为北大没有右倾你就是最大的右倾。他女儿问他这位领导是谁？陆回答说，我不能说。联系到彭真1965年6月29日上述讲话的有关内容，我猜想这位领导人可能就是彭真。当然，猜想毕竟是猜想，如若不实，那就是我在胡猜乱想，错莫大焉。

以上可见，陆平书记是在上级领导很大压力下领受反右任务进入北大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陆平来北大可说是很不逢时。因为自1957年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和方针政策急剧向左的方向发展。由于个人迷信的盛行，在中央领导集团内部毛泽东一言九鼎，领导集团内虽无不不同意见，但也无济于事，这就不能不使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断向左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后来毛泽东又大讲阶级斗争，强调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极大地影响了全国政治生活，并强令在实践中大力贯彻，使得当年的中国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主旨皆为大反右倾。在此大的政治背景之

下，陆平作为高级干部，来北大后不能不贯彻中央意图，不能不执行上级指示，不能不跟着中央的指挥棒行事。

应当肯定：陆平自1957年10月至1966年文革之前，在执掌北大的九年间，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北大的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对此，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等人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已有详细记载和充分论述，本人也有同感，在此不再赘述。

由于我谈的主题是揭示七人大字报产生的原因，所以就不能不谈北大自反右派斗争以来在多项政治运动中所长期积累的矛盾，不能不涉及到陆平和校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这丝毫不意味着对陆平在北大业绩的否定；同时，这些问题和错误也不能完全由陆平本人负责，主要是上面出了问题。

事情也要作具体分析。陆在北大九年期间执行上面的左的政策和指示，虽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但也确有积极执行的一面，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有出格的一面，这也是无法回避的。这就使北大内部矛盾不断丛生而且日益尖锐化。

下面，本人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此作些初步的剖析和探讨。

其一，在彭真的压力下，陆平一进北大就加大力度，大搞反右派补课。

陆平搞反右派补课究竟又多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其说不一。有说100多个的，有说140多个的，也有说170多个的。据我了解，较为确切的数字是多划了右派分子205人。这一数字是这样得出来的：据《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以下简称《纪事》）第628页记载，陆平实际到校是1957年10月18日，次日，即19日，副校长江隆基在北大校委会上报告：全校共划右派分子511人，其中教师90人，学生421人；另据《纪事》第1084页记载：“校委会综合1957年反右斗争及落实中央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的情况，其中说全校共划右派分子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陆平进校后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降为第二书记，也就是说反右派补课是陆主抓的；从以上两个数字对比，即从实划右派716人，减去陆来北大前已划右派511人，可以得出：陆主持的反右派补课又多划了205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比江主政时期增加了40%左右。这就使许多人内心产生不满。

江隆基被彭真批评为右倾后为陆平取代，不久就调离北大，任兰州大学校长。

这里要用一点时间谈谈江隆基。据当年我的师长辈的老教师们说，江是党内资深的老干部（行政5级）、老教育家，曾留学欧洲，颇有学识和教养。早在延安时期就从事教育工作。他在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时，非常重视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稳重，作风民主，尊重老校长马寅初，同马老相处得很好，颇受教师们的尊敬与欢迎。我入学后，曾听过他在全校大会上的几次报告，没有官腔套话，语言严谨，逻辑性强，几乎没有废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据说调任兰大校长后，很受师生的欢迎。但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曾任江隆基秘书的北大历史系校友聂大江在粉碎“四人帮”后曾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他的主持下搞了一部名为《江隆基》的七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台播放过。剧中对江的经历有详细描述，特别是对他在北大、兰大担任领导时，曾多次顶住压力，关心爱护和保护知识分子的言行有朴实而生动的描述，还增加了一些对北大、兰大老教授的访谈镜头，令人看了很受感动，催人泪下。

其二，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在北大搞反右倾运动，整人既多且狠，严重扩大化，致使校内矛盾日趋尖锐。

先说说邹鲁风之死。1958年8月，经北大、人大两校党委决定并经北京市委批准，两校成立人民公社调查组，组织170余人，分赴河南、河北进行调查。出发前，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和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对全体人员作了动员讲话。该调查组由时任人大副校长邹鲁风负责领导。1959年4月，中央决定邹鲁风调北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成为北大的第二把手。调查进行了五个月之久，于1959年5月返校进行总结，写出了调查报告和一些相关文章。这些调查报告和相关文章既罗列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发现的一些严重问题。据调查组的人说：无论是调查报告和相关材料都向两校党委汇报过，得到了两校党委的同意并上报北京市委。我近来翻阅了原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干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其中有一段记载令我看了大吃一惊。书中写道：“1959年春夏，邹鲁风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他根据师生们的调查材料，写成了一批调查报告和文章。应该说：考察团写的这些东西，基本是实事求是的（虽然把一些特别坏的典型材料都舍弃了）。北京市委（特别是彭真）非常重视考察团的报告，准备拿到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去表功。因为那时在庐山会议上，开始时毛主席一定要纠正‘左’的错误；谁知庐山会议后期的八届八中全会，忽然由纠‘左’变而为反‘右’，反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右倾反党集团’，于是全党全国都展开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北京市委为了表现他们反右倾特别积极，便把人民公社考察团的那批材料作为罪证，把邹鲁风和考察团的骨干都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该回忆录附录：《挽邹鲁风之死》）韩三洲先生在《陆平与邹鲁风之死》一文中也提供了一些情况：庐山会议之后，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通报》中，把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鉴于上述情况，北大、人大两校党委主要负责人大为紧张。按常理说，他们本应主动承担责任，与邹鲁风一起检查所谓“右倾”错误。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据调查组的很多人反映：他们却采取有违政治伦理道德的手段，把责任完全推到邹鲁风身上，说调查报告是邹鲁风背着两校党委搞的。他们对此颇为气愤。此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雷颐先生在他写的《一位革命者的反思》一文中也有记载，他写道：“本来在了解到调查的真实情况后，北大、人大两校的主要领导思想一致，都认为‘大跃进’太‘左’应当纠正，应向上级报告实情。后来全党反右倾，这几位领导人为推脱责任，便联合起来，说邹要调查组专挑人民公社的毛病，写出许多‘罪恶材料’。于是向邹发动了无情斗争，邹气愤不过，最后服药自杀。”据调查组的人透漏：邹的自杀是在陆平同他单独谈话之后发生的，故有“陆平逼死邹鲁风”一说。因陆与邹的个别谈话，是在二人之间进行的，陆平究竟讲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所以“逼死邹鲁风”之说，虽然“查无实据”，但却“事出有因。”这因一是胡锡奎和陆平等两校领导人联合起来把责任完全推到邹鲁风身上，这就把邹逼上了绝路；二是人们可以断定陆平同邹谈话肯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否则他不会在谈话后即自杀。其实在这之前，陆就对邹施加了很大压力。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批判大会上，陆曾大声斥责邹使调查组“全军覆没”，这是北大的“奇耻大辱”。这次批判会通过大喇叭向全校广播，我们都听到了。

据《纪事》记载：邹鲁风是10月26日夜间自杀的。关于邹自杀后陆平的态度，北大国际政治系老教授陈哲夫在《我在北大六十年》这一著作中有详细描述。他是这样写的：10月27日，邹鲁风自杀的消息传来，陆平感到的却是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了纸和笔，陆平就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当天党委会即开会做出决定：开除邹的党籍，真可谓雷厉风行。很快就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干部大会，陆平宣布：邹鲁风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这个大会我参加了。

据人大知情的教师说：邹鲁风是七级高干，按照时下的规定，对副部级以上的高干开除党籍，要经党中央批准。陆平北大党委匆匆忙忙做出开除邹的党籍的决定，并立即宣布，不知是否经过党中央批准了。

陈哲夫教授回忆：邹鲁风死后，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个碑，竟不被批准；邹夫人方志西只好在一块砖上写了“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

李新在《流逝的岁月》这本回忆录里还谈到了一件与邹有关的事：“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决定为1959年错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为此，高教部长杨秀峰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人大和北大作调查。一天，杨秀峰去看吴老（吴玉章），问吴老：人大党委是否有过关于人民公社考察团的决议。吴老说：‘我年纪大，党委会我不参加。李新是党常委，可以问他，他现正在我这里。’于是便把我从书房里请到客厅去见杨部长。我向杨详细说明人大和北大组织人民公社考察团以及邹鲁风被迫自杀的全过程。并明确地告诉他：所谓两校党委的决议全属捏造。于是杨秀峰去向胡锡奎要人大党委决议，胡锡奎拿不出来。杨秀峰严肃地批评胡锡奎：‘你这样的老党员，老资格的大干部，怎么能撒这么大的谎！’杨秀峰又到北大去找陆平，向他要北大党委决议。陆平支吾其词，被杨部长狠狠骂了一顿。因为陆平年纪比杨秀峰小，资历也差一些，所以杨对他更不客气。”

关于杨秀峰部长向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追查人大党委决议的内容，李新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说明。对此，我曾通过一些渠道询问过人民大学的几位老教授和老干部，得到的回答有两种：一种说胡锡奎等人曾向高教部领导谎称人大党委做出决议，认定《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是邹鲁风背着党委搞的，校党委既不知情，也不同意；另一种回答则说胡锡奎等人向高教部领导谎称人大党委已做出决定，为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平反，但此时尚未平反。以上两种说法尽管内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胡锡奎等人向高教部领导说了谎话。故杨部长从李新那里得悉真情后大为恼火，当即严厉批评胡锡奎说：“你这样的老党员，老资格的大干部，怎么能撒这么大的谎！”，又到北大“狠狠骂了一顿”陆平。

邹鲁风被迫自杀时年仅48岁，作为高级干部，正是年富力强为国家作更大贡献的年纪，他的死实在让人们同情、惋惜和愤慨。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979年5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邹鲁风举行了追悼会，赵紫阳、王震、方毅等送了花圈。参加追悼会的有宋任穷、郑天翔、邓力群、林乎加、王猛、陆平等人，北大、人大很多师生也参加了，人数相当之多。追悼会由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周培源致悼词，对邹鲁风的一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总算是还了一个迟到的公道，可以告慰屈死的邹（鲁风）校长在天之灵了吧！

还应说到：邹自杀后，调查组的人员统统被审查，人人过关受到批判。据《纪事》688页记载：在调查组的167人中，重点批判了42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9人，按严重右倾错误受处分的还有11人。但实际情况不止于此，组员们回到原单位还要被批判。例如我所在班的一位品学兼优的陈姓同学，仅是调查组的一般成员，竟受到了留团察看处分。

再谈整人过狠的几个典型。

在陆平的主持下，北大反右倾整人既多又狠。全校究竟整了多少人，划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得而知，《纪事》没有记载。以我所在的哲学系为例，党员教师仅有30人左

右，被整的就达18人之多。这个数字不是我统计的，而是“国际饭店会议”期间哲学系整风领导成员刘文兰于1965年8月24日向邓拓禀报的。连任继愈这样的为人正派，埋头做学问，曾被毛泽东誉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宗教、佛学问题实属凤毛麟角的著名学者也被批判了。刘在向邓拓禀报时说：“任继愈有些倾向于那边（指被整的社教积极分子）。任继愈在反右倾时被批判过，他说再呆下去会遍体鳞伤，在王庆淑的领导下政治上没有安全感。”可见打击面之宽。

说整人太狠，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汪子嵩，被整的最惨——给他戴上了置人于死地的三顶大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下放到门头沟山区监督劳动。

汪子嵩，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地下党老党员，毕业后留哲学系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后，任哲学系常务副系主任（系主任郑昕是一位民主人士），主持系里的日常工作。汪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和人品上都是较好的，很有才气，不到30岁就晋升为副教授，作风民主，为人也很谦虚，从不整人，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和尊重。他长我10岁，是我的老师，又是同一届党总支委员。遭此不测后，得到了我和许多同事及他教过的学生的同情。

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因为他被委派参加了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并任一个大组的组长，邹鲁风被迫自杀后，他便成为陆平整肃的最大对象。在陆平亲自主持下，开了数次大会对汪进行批判，最后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二顶帽子是“漏网右派”。在反右时期，汪是哲学系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哲学系有几名教师对时任党总支书记的王庆淑意见很多，颇为不满，在鸣放时期提出尖锐批评，其中有一位是中央马列学院第一期两年制毕业的老干部金志广，由于情绪激动，高喊“打倒党内黑暗势力”，于是这几个人便被打成右派分子，划为“右派反党小集团”。在哲学系领导讨论是否将他们划为右派分子时，汪曾流露了对这些教师的同情态度。好了，这次老账新账一起算，你当年不是同情右派吗，你就是“漏网右派分子”。右派的帽子就是这样给戴上的。

第三顶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大概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吧，只要存心想整他，总能制造出莫须有的罪名，于是他就莫名其妙地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这三顶帽子一戴，汪子嵩可就惨到家了：开除党籍，下放门头沟山区监督劳动。那正是三年饿肚皮时期。后来，中央决定为反右时期被错误处分的人平反，校、系两级领导又迟迟不给平反。在一些党员教师和干部多次提出批评后，方于1962年7月予以平反，撤销一切处分。此后，汪便调到了《人民日报》社，任理论部副主任。退休后的三十多年期间，他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研究，主持编写了四大卷近300万字的《希腊哲学史》，成为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最有权威的著名专家。今年初，以97岁高龄辞世，《南方周末》发了一整版文章以示纪念。

第二位是沈少周。沈是原北师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期调入中央马列学院第一期理论班学习两年后，被分配到北大哲学系，任党总支委员兼系秘书，是汪子嵩的主要助手，也因为反右派时期同情被错误打成右派分子的上述几位教师，并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些不同意见，被多次批判后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两项大帽子，被开除党籍，同汪子嵩一样下放门头沟山区监督劳动达数年之久。

第三位是大名鼎鼎的丁石孙。丁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任北大数学力学系常务副系主任，因系主任是老教授段学复，实际上由丁主持系里的日常工作。丁不仅在数学学科方面造诣颇深，为人正派，工作能力很强，而且思想锐敏，很有见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全校副教授和处级以上干部民主推选、经国务院任命为北大校长，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丁石孙主政北大时期，业绩极佳，作风民主，处事果断周到，加之亲民，深受北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季羨林先生讲话时曾饱含深情地说：我们北大应当记住两位校长，一位是蔡元培，一位是丁石孙。此言一出，引来一片掌声。可见丁石孙在北大威望之高。他后来虽身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高位，但一如往常，仍很谦虚。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丁石孙答记者问，题目为《我怎样从当北大校长到辞职北大校长》，很长的一篇采访记，丁在谈到季先生在百年校庆的讲话时连忙说：“我担不起，对我太过誉了。”

这样一位优秀人才，在北大反右倾运动中，竟遭到无情打击，被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出党。

据数学系知情的教师说：丁在主持该系工作时，很有头脑，很有主见。对陆平校党委布置的任务，凡是他认为不妥的，往往顶着不干或加以淡化，且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对整人的事儿从不积极。这就引起了陆平等人的不满，因此，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成为整肃的重点对象，大加批判，后来又升级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前几年我同老伴去颐和园游览，恰巧遇到过去同住北大23楼的数学系办公室的一位干部，名字我记不得了。因多年未见，我们坐在走廊的凳子上聊得甚是投机。我顺便问他：当年你们为什么把丁石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他回答说：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纯粹是为了整人，我参加过对丁的调查，都是些莫须有的事儿。加上他又是个孝子，十分重视孝敬老母，就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帽子就扣上了，实在滑稽！

以上三人的遭遇，是我所知道的，仅是例子，还有什么人，就不清楚了。

从以上三人的遭遇来看，陆平等在整人方面，实在是太出格了，严重违背了党的政策。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党集团，但不仅给彭德怀保留了党籍，还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内矛盾。而陆平等人在北大却大大加码，给这3个人（或许还有其他人）扣上了“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按敌我矛盾对待和处理。

在反右倾前后，北大还掀起了一阵“拔白旗”的旋风。大批教师、学生中的业务尖子，认为他们是走“白专道路”。后来成为两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选就曾作为“白专”典型被批判过。这就大大损伤了广大师生钻研业务和努力学习的积极性，引起不满。

在此期间，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根据校领导的布置，各个班级的党团支部要经常对本班的学生进行摸底排队，谁是右派，谁是中左，谁是中中，谁是中右，每月要向系总支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汇报。这不仅造成了学生与党团组织的矛盾，而且也在同学之间产生分裂。尤其使那些被划为中右的学生长期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影响到毕业分配和今后的工作安排。

更为严重的是，据有些知情者反映：在1960年至1961年期间，北大划了上百名“反动学生”，将他们开除学籍，遣返回家。这样的处理，比右派分子要严重得多。学生中的右派，除谭天荣、龙英华等头面人物被劳动教养外，一般右派分子在校期间大多都被摘掉

了“右派”的帽子，少数未摘帽者也都随原班正常学习，照发毕业证书，由学校统一分配工作，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当然，因为是“右派”或者“摘帽右派”，不论在工作分配的地区、单位和今后工作的安排上，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无论如何，总能算在职人员，照领工资，生活不成问题。但这上百名“反动学生”的遭遇就大不同了。他们的遭遇要悲惨得多：他们被遣返原籍后，家在农村的只有当农民一条路，而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闹大饥荒，饥饿难耐在所难免；家住城镇的更无生活来源，只好靠打零工度日，而那时不像今日，要想找到一事做，实在难上加难！同时，这些人又背着“反动学生”的恶名，倍受歧视是在所难免的。仅就我所在的哲学系，被定为“反动学生”而被开除学籍遣返回乡者，有名有姓的就达七人之多：56级的有王辅臣、杨去塞、陈兆丰、黄美琦4人；57级的则有赵又春、张国珍、杜永祥3人；其中杨去塞来自北京市公安局，遣返后长期在该局农场被监督劳动。这些人之所以被定为“反动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等等发表过不同意见，或表达了些许不满情绪；家在农村的放假返校后则如实反映了农村闹饥荒和饿死人的情况。所有这些，统统被拿来作为定“反动学生”的根据，真是荒唐至极！将他们遣返回乡的任务，大多派青年教师承担，例如56级的王辅臣就是派我和系团总支书记王义近在极其寒冷的冬天将他送还秦皇岛农村的。57级的赵又春、张国珍本是一对恋人，颇有才华，遣返回湖南后生活无着落，只得饿着肚皮给铁路上砸运石子挣点小钱度日；据57级的校友说：上世纪80年代北大为他们平反后，受聘于湘潭大学，业绩优秀，颇受欢迎。

令人遗憾的是：在王学珍等人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中，对此不见记载，仅在第673页上提到：“校人事处统计，1960年9月—1961年1月30日，学生退学28人（其中因病17人），勒令退学和取消学籍14人，开除学籍11人，留校察看及记过等处分5人。”至于开除学籍的原因则一字未提，不知是什么原因。是疏忽吗，是不了解情况吗，还是有意隐恶，我不敢妄断。但如果说他们不了解情况，我还真的不敢相信。因为当年王学珍就担任北大社科处处长，哲学系在他管辖之内，该系一下子就开除7个“反动学生”，并派人遣返原籍，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况且，《纪事》所写的数字仅限于1960年9月—1961年1月这4个月。那么在之前和之后呢？究竟划定了多少“反动学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前面所说的100多名，只是坊间传说，到底定了多少，官方没有数字，连“反动学生”这个字眼都不提，未免使人纳闷。

我之所以着重谈到这一问题，是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它说明北大的反右倾运动实在太出格了，本来反右倾仅限于党内，而今却搞到学生头上去了，而且处理得那么狠，那么没有人性！

综上所述，在陆平带领下的北大反右倾运动，确实是严重扩大化了：不仅党内严重扩大化，党外也严重扩大化；不仅在教师干部中严重扩大化，在学生中也严重扩大化。整人既多且狠，这就人为地制造了诸多矛盾，也是北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发端和重要原因。

你想啊，一些被整的人很有意见自不待言；他们的众多亲朋好友内心自然非常不满；被整者的大批同情者也很有意见；还有众多与被整者毫无瓜葛，只是出于正义良知而鸣不平的人。这四个方面的人加在一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自此之后，陆平等校系领导便坐在了矛盾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只是他们大概还没有意识到罢了。

就连一向支持陆平的彭真也不得不承认：“1959年反右倾，陆平当了校长，又犯了扩大化，过火斗争的错误。”（见彭真《6·29讲话》打印稿第8页）。

其三，批判老校长马寅初。

马寅初是建国后北大第一任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名流，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他在北大主政期间作风民主，谦虚亲民，尊重党委的意见，与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相处很是融洽，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与爱戴。那时的校友都还记得：马老每次对全校师生讲话时，一开口便说“兄弟我”如何如何。每年元旦都在大会上向全校师生拜年，还说“恭喜，发财”之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的话。

批判马老，责任不在陆平和北大党委，完全是上面授意。因为马老发表了《新人口论》，主张节制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提倡计划生育，这就与毛泽东关于“人多，热气高，力量大”的论断相抵触。这不是与毛唱对台戏吗？那还了得，在那个时代，还能不批判！应该说：批判马老，陆平与北大党委只是奉命行事。

但北大批判马老的声势搞得实在是太大了。陆平的女儿写文章说：北大未开过批判马老的大会。这不是事实。大概她不是北大的人，未身临其境，可能不甚了解当时的情况。据我所知：当年北大曾多次开过大会、小会批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全校大会（据《纪事》记载是8000多人的大会），并且通过大喇叭向全校广播。在这次批判会上，发言者不仅上纲上线，说马老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如何如何反动，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还公然在大会上发出了污辱马老人格的言论。事情是这样的：马老是浙江人，地方口音浓重，为了工作、生活上的方便，学校给他配了一个浙江籍的姜姓女助手；就是这位姜姓女助手，竟然在大会上发言说：一次她陪同马寅初到浙江出差，在杭州某饭店用餐时上了一盆清炖老母鸡，马只喝了鸡汤，未吃鸡肉，于是在结账时便不肯给钱，说“马寅初喝了鸡汤不给钱”。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全校师生面前污辱马老的人格。然而当时大会的主持者非但对这样的发言不加制止，反而与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一起哄然大笑，以示对发言者的欣赏与支持。此事全校尽人皆知。

除了大会批判外，校领导还号召给马老贴大字报：在大饭厅墙上、著名的“三角地”，到处都是批马大字报。这还不算，竟然动员把大字报贴到燕南园63号马老的办公室和卧室，还组织人们前去观看。我和哲学系56级的许多同学都去看过。那时，我是第一次到燕南院63号，这是马老独居的一个典雅幽静的院落。我们进去看时，不仅院内满墙都是大字报，还贴到了室内走廊和办公室，就连马老卧室的床头之上也贴满了大字报，真可谓“琳琅满目”。就这样子，马老还能在这里办公和休息吗？只好躲到城里的家中居住。这分明是摆出了一付要赶走马老的架势。

这里要说明的是，北大确实没有面对面地批过马老：一是因为马老是人大常委，又是周总理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不经中央批准，谁也不敢面对面地批判他；二是北大领导不能也不敢对马老搞面对面的批判，因马老秉性耿直，既不信邪，也不怕压，若面对面地批判，他必反驳歪理和污蔑不实之词，这就难以收场了。其实这种背靠背地批判，更加恶劣，因为这就剥夺了被批判者的答辩的权利，而批判者则可信口胡说，那位姜姓女助理对马老进行污蔑性的人身攻击即是一例。

除校内大批判外，北大学报和社会上的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马老在《光明日报》或《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敬文章，他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但仍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他的铮铮铁骨，实在令人敬佩。在一些回忆和纪念马老的论著中，曾提到周总理曾同他这位老朋友促膝谈心，劝他作些检讨，好让事情平安了结，但被马老婉言谢绝，始终未做任何检讨。真是有骨气啊。

1960年3月31日，马老被免去北大校长职务，美其名曰“同意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陆平接任校长，这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奇迹：一位既不是教育家，又不是文化名人，甚至连个副教授职称也没有的干部，竟然当了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这在北大校史上堪称一绝。

马老被免去北大校长后，坊间有一传说：“陆平逼走了马寅初”。此系谬传，没什么根据。马老的免职完全是上边的决定，与陆无关。当然，当年北大声势浩大的批判，大字报都贴到了他的案边床头了，试想马老还能在北大呆下去吗？一位堂堂大国的总理，居然连他亲自任命的北大校长都保不住，实在值得令人深思！

谈到马老，还有两件事我也要在这里讲讲：一是有一年，周总理亲自陪时任缅甸总理的吴努到北大来讲演，内容是有关佛教和佛学方面的。校方决定哲学系全体师生到办公楼听讲。讲演由马老主持，吴努讲完后，马老请周总理讲话，周连连摆手示意不讲了。哲学系师生因极想听总理讲话，即热烈鼓掌，表示热情欢迎周总理讲话。这时马老更来了精神，走到总理面前又拉又拽，将周总理拉到讲台边。周总理见拗他不过，只好从命，非常机智而又得体地讲道：今天我们有幸听了吴努总理的讲演，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国家是提倡“百家争鸣”的。言罢赢得哲学系师生一片掌声。由此可见马老与周总理友谊之深。另一件事是2006年是我们56级入学的50周年。这年春天我和老伴及阎大班（阎慎明，因年长我们，又长期担任班长，故我们班同学都称他为“阎大班”）在杭州拜谒了老校长“马寅初纪念馆”。此馆是中央批准由杭州市大力支持建成的，是一个有二层楼房的院落，幽静典雅。楼前有一尊马老的雕像，还是那般和蔼慈祥。楼内陈列着许多马老的著作和数种传记、大批马老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以及同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合影，还有许多有纪念意义的物件。小楼二层设了一个当年批判马老的专栏，陈列出一批当年批判马老的文章，不过作者的名字都被盖掉了，但有的文章我们一看题目就知道是北大哲学系谁写的。馆长是马老的嫡孙，他听说我们是当年北大马老的学生，十分热情地予以接待，主动介绍建馆过程并陪同参观讲解。当我问他为什么把文章作者的名字盖掉时，他回答说：“还是给他们留点脸面吧，何况他们也是奉命行事。”临走之前，我们三人再次向马老雕像鞠躬致敬并同馆长在雕像前合影留念。

其四，陆平在办学方面虽有一定成就，但瞎指挥颇多，引起师生强烈不满。

实事求是地说，陆平是一位既有能力又有魄力勤勤恳恳工作想把北大办好的老干部。但是由于他长期在地方和铁道部工作，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学校像北大这样的知名学府涉及不多，经验不足，加之主观性较强，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因而在办学方面出现了不少瞎指挥现象。

以下仅依照我所知道的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关于“除四害”运动。

当年，毛泽东号召“除四害”，即消灭苍蝇、蚊子、麻雀、老鼠，下面便闻风而动，不少单位虚张声势，“意思意思”也就过去了；而北大却贯彻得特别积极。据《纪事》记载：校党委于1958年1月14日召开了全校动员大会，提出了“争取在三月底使‘四害’在我校基本绝迹”，“一年内使我校成为无‘四害’学校”的口号，并且动员全校师生立即行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说可笑不可笑，荒唐不荒唐。一时间学生们满校园敲着脸盆，挥着衣裳，高声呐喊，吓唬麻雀，好让它们到处乱飞不停，疲劳轰炸，落地而死。还真有倒霉的麻雀这样丧命的，这便是成果。在这期间，学生们基本不读书了，专搞卫生。宿舍前后每

天都扫得干干净净，宿舍、厕所也弄得一尘不染，以迎接校领导的检查。检查组的人员戴着白手套到学生宿舍到处乱摸，书架上，门框上，墙角处，都要仔细检查，如不合格，必须补课。当时我们哲学系的男生住在38楼，记得陆平等校领导就亲自带领检查组来检查过。学生们对这么瞎折腾很是不满，戏称：我们都变成清洁工了。此事多少年后校友聚会回忆往事时仍被传为笑谈。

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组织文科等系长期下放农村、工矿劳动锻炼，荒疏学业。以我所在的哲学系为例，自1958年8月25日起，全系师生都下放到大兴县芦城乡参加劳动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连冯定、冯友兰等老教授和在读的苏联研究生及六、七名越南本科留学生也不例外（老教授和留学生提前返校），直到1959年5月，周扬批评说：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如还不回校读书，就要变成费尔巴哈了（费尔巴哈，为18世纪法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评论费尔巴哈时说他的唯物主义之所以没有提升为辩证唯物主义，重要原因之一是他长期居于穷乡僻壤。故周扬由此批评）。周批评后，方于当年5月底返校，在农村长达八、九个月之久。

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地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社员们出工不出力，致使农田里野草遍布，庄稼极难生长，于是当年夏天又动员哲学系师生到黄村公社“抢荒”，主要是拔除生长极快的野草“拉拉秧”。1959年年底，又动员组织哲学系学生到黄村公社搞所谓“整社”，又长达三、四个月之久。总之，以我所在的哲学系56级而言，自1958年8月至1960年3、4月，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上课读书。据说中文系也下放京西煤矿跟班下矿劳动，时间也比较长。

例三，1960年秋末到冬天，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闹饥荒、饿死不少人时期，北大竟组织学生饿着肚皮去参加抢修铁路的重体力劳动，还发起所谓劳动竞赛。当时，北大在昌平县较远的农村建了一个分校，名曰200号，要把一些涉及机密的系和专业，如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力学专业等，迁往该分校。陆平来北大前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他与铁道部联系得到大力支持，决定从南口至200号分校修建一条铁路支线，以便各种设备和物资的运输及师生的往返。决定一旦做出，立即实施，就在1960年秋末和冬天，动员大批学生和青年教师前往抢修铁路，本人亦在其内。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1960年正是三年饥荒最为严重的年月，男生每月粮食定量只有30来斤，女生27斤左右，不仅无肉无鸡蛋，油水也极少，每人每月半斤油。平日在校时，尚且时有饥饿感，及至饿着肚皮抢修铁路，建路基、砸石子、运枕木这样一等重体力劳动，就更受不了了！加之南口地区是一个大风口，那年寒流又来得早，天气异常寒冷，说当时修路的师生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实不为过。由于校方不顾学生的健康状况，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强令学生参加如此繁重的累活，致使大批学生得了浮肿病，女生不仅不少人浮肿，而且长期闭经。据说此事被反映到中央领导那里，曾严厉批评，校方才匆匆忙忙停工，让学生返校。一些病重者则住进了校医院，我爱人就因严重浮肿，在医院医治达20天之久。

因为受到上级批评，那时校领导十分紧张，生怕死人闹出更大影响。于是便再三强调“劳逸结合”，下令学生宿舍每晚9时必须统一熄灯上床睡觉，校领导每晚亲临学生宿舍检查。

这条铁路支线最终并未修成，许多筑路的材料都被沿线农民拿走，真可谓劳民伤财。

例四，要把北大变成半工半读的大学。

在办学方针上，学校积极贯彻毛泽东左的方针政策，日益向左的错误方向发展。陆平于1965年12月30日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向哲学系与会者的长篇讲话中说：“哲学不是第一，第一是阶级斗争。”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今后北大要办成半工半读大学。他强调：“对于半工半读的深远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这是培养又能作体力劳动又能作脑力劳动的新人，根本消灭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为将来完全消灭“三个差别”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这是努力促进文化革命，逐步消灭“三个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情”；“北大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势力是很大的，不仅有大师冯友兰，还有一些国内第一流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决不要看他们一时的进步表现，就放松同他们之间的斗争”（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这里我必须指出：问题的根子在毛泽东，陆平校长仅仅是积极执行而已。

由于陆平和校党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反右倾运动中，整人过多过狠，再加上以上所说的胡乱作为，引起了周培源和一些老干部、老专家的不满。据校友王复兴先生在他的著作《抢救记忆》中记载：“周培源于1965年7月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与周恩来总理相处时，在飞机上总理问他北大的情况，周培源说北大很复杂，要写个材料给总理。后来他转交给总理一封信，状告陆平在北大‘乱干’，把北大搞得很乱。北大社教后期，万里找周培源谈话，要他改变对陆平的看法，周培源不接受。5·25大字报贴出后，周培源在现场看了大字报，回家对夫人和孩子说：‘我向总理告的就是大字报上的三个人。’”（见《抢救记忆》第52页）类似这种论述，我在校友们的其他论著中也曾见到过。

其五，在校领导班子中，有亲有疏，致使党委几位主要领导人也对陆平不满，产生矛盾。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后来借调到北大社教工作队之后才知道的，将在后面谈北大社教运动时再讲。

从以上五个方面，不难看出在社教以前北大内部矛盾已层层叠加，且日趋尖锐。这里要顺便指出：陆平来北大后，在反右派补课、反右倾斗争和批判马寅初等一系列表现，显然得到了上峰的肯定与欣赏，否则也不会任命他为北大校长，也不会文革前最后一次提升工资时，将他从高于八级提到七级。

我还得再重复一遍，陆平校长来北大后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根子在上面，主要责任不在他身上。然而毋庸讳言，在有些事情上他积极执行，且有些很出格。这也是实情。他的有些作为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也是事出有因。

王复兴校友在他的《抢救记忆》里写了这样一段：“我的北大历史系学长，62级毕业生王增喻，在《北大五年》（刊于《北京大学新闻网》）一文中，详述了陆平领导北大期间，57年反右，58年‘拔白旗’，59年反右倾，再后的批判马寅初，61、62年教育改革中本人的经历与感受。他感到：他在北大的五年（57年至62年）是‘多灾多难’的时期，说‘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并说‘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谈及陆平，极有恶感。’”

这是老校友的心里话。如果认为对陆校长“极有恶感”一词有点刺耳，那么不妨换成另一种说法：老北大人和北大老校友，对老校长马寅初和老书记江隆基多有怀念，对健在的老校长丁石孙不仅像季羨林先生说的那样“应当记住”，而且尊敬有加；然而对陆平校长真心

诚意怀念的却少之又少。这也算是实情吧！我不认为这是陆平校长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未完待续）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 【亡灵祭坛】

### 赵树理“文革”中遭毒打致死真相

• 赵魁元 •

今年（2010年）9月23日是作家赵树理遇难40周年祭日，1970年9月23日凌晨，赵树理带着满身伤痕含冤逝世，终年64岁。

赵树理，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以擅长描写农村、农民而著称的作家，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毛泽东称誉他为“人民作家”，胡耀邦把他同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老舍并列，称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语言艺术的大师”。

赵树理有篇小说叫《套不住的手》（载《人民文学》1960年11月号），他自己的手却被“文革”的枷锁套住了。

#### ◇ 风暴乍起——赵树理与周扬绑到一块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诬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预示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1943年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相继发表，在解放区引起极大反响，赵树理一举成名。小说不仅销售量大，还有数以百计的剧团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

赵树理成为边区最出名的人物之一。曾到过边区访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甚至这样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与众多读者的反响相比，文艺界却有些冷淡。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还刊发了一篇批评文章。

周扬是发现赵树理的伯乐。1946年，周扬到晋察冀解放区担任宣传部长。6月，他在张家口编印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准备带往上海，这使他有幸审阅了赵树理的全部创作。这位很有眼光，善于掌握文艺界气候的理论家，撰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高度评价赵树理。

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代表着中共文艺界领导对赵树理创作风格的肯定。之后，赵树理的创作还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高度赞赏。时隔15年之后，周

扬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上给1959年曾被批判为“右倾”的赵树理以高度评价，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赞誉赵树理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

#### ◇ 要和造反派“拼刺刀”

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当时他在山西省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7月20日、21日，由山西省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揭发”批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批判，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斗。

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全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上面写着带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后面站着一排“黑爪牙”：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戏校的校长、书记……

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们撂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人们没料到他敢这样做，顿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黑压压的会场鸦雀无声。主持批斗的造反派头头一看阵势不好，赶紧带头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会场才又喧闹起来。

造反派头头大声喝道：“赵树理！造反派说你是黑帮，你胆敢反抗，这是反革命行为！罪该万死！我问你，你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

赵树理慢条斯理地答道：“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

这番俏皮话，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采取比较“温和”的车轮战术：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容他解释，更不许他辩驳，只要他承认是“黑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刺刀拼了整整两天两夜，倔强的赵树理就是不承认，还抗议道：“你们这种做法怎么能叫‘拼刺刀’？你拼我也拼，那才叫拼刺刀！现在只准你们刺我，却不许我申诉，辩驳，这叫捅刺刀！”然而小将们却不吃这一套，“造反有理！管它是拼还是捅，反正你得承认是黑帮。我们的刺刀不见血是决不罢休的！”

8月18日，赵树理被押往长治，隔离在地委招待所，听候晋东南地区的造反派批斗。在隔离反省期间，赵树理先后写过三份检查材料，他真不愧为“天真的人”，竟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比喻为轻松愉快的打扑克，把自己在其中的命运看作是插错了牌。

#### ◇ 从“文斗”到“武斗”，肋骨、髌骨全断

1967年，全国性的报刊开始批判赵树理。《解放军报》刊文说“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报刊纷纷转载，对赵树理的批判扩大到全国。江青2月1日声色俱厉地批判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说它“坏透了”！于是，对赵的批斗再度升级，被“揪回”太原。

太原的造反派争抢着批斗赵树理。他几乎每天都被拖上卡车，挂上大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从后面扭住胳膊，抓住头发猛拉后仰——仰头示众，再猛按前躬——低头认罪。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拉下来朝他胸部猛击一拳，待赵树理跌倒后，又向他胸部猛踢一脚，赵树理的两根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骨戳通。山西各地的造反派都看上他，经常在半夜蒙住他的眼睛，从床上拖到卡车上，拉到全省各地批斗。

1969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时，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摆起三张方桌，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接受批斗。批斗过程中，一个搞恶作剧的打手狞笑着对他说：“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这回就让你来个真正的‘三关排宴’！”说罢，在他背后猛地一推……桌子被推倒了，赵树理摔倒在地，昏死过去。当赵树理苏醒过来时，发觉自己的髌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不能自理。

赵树理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通宵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炉，胸伏床沿，爬着度日熬夜。他的“文革”难友、作家西戎回忆：“他手中曾经写过许多优美作品的笔，此刻就连逼着叫他写‘检查材料’也感到十分吃力了。我们劝他上医院，医生一看病历，惊问：‘作家赵树理就是你？’他说：‘这种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医生要他立即住院治疗，赵树理说：‘我是身不由己啊！’他带着药片回来，继续接受批斗。”

◇ 生日前一天，在痛苦中去世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赵树理被押入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赵树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被打断的肋骨生了炎症，烧得他浑身上下火炭一样。他本来是个怕冷的人，现在却不得不脱掉衣服，光着膀子才稍感凉快。他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甚至不准走出房门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回忆：1970年9月6日，她几经周折获准探望父亲。当赵广建来到关押赵树理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时。看到“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的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看到这个情景，我悲痛难禁，一下子哭出声来。”赵树理对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帮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后来，赵广建把父亲写的字交给了周扬。

9月16日这天，老伴违反禁令，为赵树理做了沁水风味的炉面（一种饭食）。吃完饭，他习惯地用筷子在碗边上敲打着上党梆子的鼓点，心情比较高兴。岂不知，一场规模空前，将置他于死地的批斗大会已准备就绪。

9月17日，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叫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手捧住脑袋，认真听批判。过了半个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头上滚下黄豆大汗珠，两腿索索颤抖，一头栽倒在地……。

1970年9月20日，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不管谁劝说，都无声地报之以闭目和摇头。9月22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胡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他被送到医院。23日凌晨2时45分，离他64岁的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终于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逃脱了无边的苦海。

□ 原载《文史参考》2010年



~~~~~  
【风雨欲来】

青春绽放在法西斯旗帜下

• 陶洛诵 •

在这个恐怖专制虚伪的时代，师大女附中出了一个勇敢揭露社会真相的王友琴，她的作品完全可以媲美二战时的“珍妮日记”。——仅将此文献给这位不寻常的女士。

师大女附中座落在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以高质量的教学闻名于世。1964年，我开始在这里就读高中。我所在的高一（四）班有40名同学，全部都是从外校的初中部考进来的顶尖优秀学生。全校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都是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年龄一般在十二岁到十九岁之间。花样年华，含苞待放。

与我原来所在的女十二中不同的是师大女附中浓烈的政治空气。开学迎接我们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学习榜样是一位解放军战士雷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私忘我甘当革命螺丝钉的精神。我觉得雷锋没什么可学的，尤其是他助人为乐的事迹更算不了什么，我做的比他多多了。我把我的想法跟兰姐说了，兰姐是我一墙之隔的邻居钟大妈的大女儿，她是大学生，我和她妹妹菊同龄。兰姐很认真地给我讲解学雷锋的伟大时代意义，顺带着提到一种见解，认为学雷锋降低了全社会的水平。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为自己的想法有认同者而暗暗高兴。

运动落实到每个班级是让每个同学“暴露思想”，脑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符不符合党的要求。大家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说，最多想的是当科学家，即成名成家。我的同桌涛笑着说：“你们都想成名成家，只有我想当传达室的门房，我觉得门房最省力气。”涛说这番话是为了批判自己怕苦畏难贪图安逸。一个戴着深度眼镜，梳着两条细细辫子的高个子女孩用不屑的口吻说：“你们都想成名成家，世界上哪儿那么多名和家啊？”她叫顾乃昭。“喏，这种学校里，还有不想成名成家的。”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从幼儿园起，被训练出热衷发言的习惯，我历数自己为考师大女附中如何奋斗和努力，进而上大学，当科学家。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只有一位有双滴溜溜圆大眼睛姓梁的同学，稍带尴尬的微笑，冷静地观察着每一个人，一言不发。被问到头上，她咬紧牙关说：“我只有报恩思想。”她和我小学初中都是同学但不同班。她爸爸原是工程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改造，没有了工资，靠妈妈糊纸盒不够维生，政府每个月给她十二块五的补助。她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发言，一次她嘲笑洋洋暴露的思想，洋洋爸爸是个外交官，她说自己有“崇洋媚外”的思想。洋洋不高兴地反唇相讥：“我不像你，除了‘报恩思想’什么都不说。”洋洋的父母常年驻国外，她住在监护人家里。洋洋很健谈，她告诉我：“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爸爸他们都发了枪。”适逢她父母回国休假，“我妈看戏，说不好看，里面没女的，我就跟她吵。”“我跟我妈说我暴露的思想，我妈说你有那么坏吗？”

学校组织大会，让我们还能听到他们选出的不同班不同年级的同学的发言，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华苏的发言，她提到自己在一次数学竞赛报名时怕自己拿不到名次而没报名。高二（三）有个叫杨鸥的发言特别有趣。杨鸥胖乎乎的，说话很快，她在高一年级四个班集中起来做的发言。她们家九口人，爸爸本是中学校长，“反右”时，除了年幼的她和她妈妈，她爸爸和六个哥哥姐姐全部被划为“右派”，她说：“有人叫我‘反动学生’，我就怒气冲冲地给了他一拳。”她坦率幽默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校领导发现“社教运动”“暴露思想”让一些人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居里夫人不能重新再提。他们煞费苦心地找来一位解放军大校军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介绍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文革”一开始，这成为罪状之一，引导学生向封建人物学习，不做社会主义接班人。

校领导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说明他们心里已经没了底。

学习的时间被挤得差不多了。政治成为大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在无中生有的喧闹中实质是什么样的人符合时代的需要。我们怎样才能把自己变成样板雷锋？

具体的榜样终于有了，宋彬彬，一个高三年级的学生，她要被发展成共产党员了！她的入党发展会在礼堂举行，谁都可以参加。那天发展会，礼堂里三层外三层挤的水泄不通。

去晚的人连往里看一眼的可能都没有。窗户外面有人搬了椅子蹬上去看。宋有两条信息不径而走，一是中共高干的女儿，二是学习成绩不错。“文革”一开始，有学生写大字报指责校领导的“罪恶”，借党员发展会之机，整干部子弟等等。

我尝试着适应这繁忙的新环境，我在初中门门功课满分，每次考试稳拿第一的时光不复存在。化学考试大多数同学只得四分，梁同学独占鳌头地得五分。问她如何复习的？她谦逊地笑着：“整本书我都快给抄下来了。”没有人能和梁做朋友，尤其是一次春游，和妹妹班（初一四）做抢水壶的游戏，她用手狠狠剁一个抢她水壶的小女孩的手，正好被班团支书尹看见，气得尹大喊：“梁××！你把水壶给她！你把水壶给她！”事后，尹把这事儿向别的班干部谈，还模仿梁剁人手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梁相中了我，或许她看我比谁都傻，对谁都一视同仁。在一次我们班组织去过崇文区清洁队劳动后，她拉着我又去了一趟。我心里其实老大地不愿意，又不好拒绝。我们俩毕竟还是有些共同回忆的事情的。小学四年级时，我们俩被从不同的班里挑出来，在大会上朗诵诗歌“少年英雄刘文学”，歌颂的是一个与偷辣椒的阶级敌人（被打倒的地主分子）做斗争而光荣牺牲的故事。一次去机场给外宾献花，我把发的果子面包吃完了，回家的路上，看她手里还捧着完完整整的长方形大面包就跟她要，她拖长地哼一声，抱着面包扭过身跑了。

从此，每个星期六，我在梁同学的领导下，跟她去崇文区清洁队掏茅房，她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但她却告诉了班主任李老师和团支部书记尹同学。“文革”开始，班上团干部议论，李老师让她们发展梁入团，幸亏她们立场坚定，阶级路线掌握得好，就没让梁入团。此时梁已不在北京，高一没上完，她爸爸刑满释放，她们全家搬到河南新乡去了。

我们班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是汪同学，她不属于死用功的类型。她和梁的共同点是皮肤白，大眼睛，长得漂亮。她安安静静地从不张扬，她从她妈妈那儿知道的我，说我写的作文：“像诗一样的语言。”她妈妈是灯市口女中初三年级的语文老师。灯市口女中和女十二中本是一个学校，初中部过于庞大，有十四个班。就分成两个学校。前四个班分到灯市口东口的高中部所在地，仍叫原来的校名。其余的十个班留在灯市口西口的校园，命名为灯市口女中。我所在的班被分到女十二中。汪同学梁同学分在另一半。她妈妈没教过我，是在升学判卷中知道我的。考试题目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像小学考初中“我们俩是好朋友”一样，我的作文是满分，并被选为范文。汪视学校的功课如草芥，高中二年级时，老师布置寒假作业写大字，我老老实实写了四大本，汪一个字不写，开学要交作业，她跟我要去两本敷衍了事。人家牛是有理由的，听跟她一起上过初中的同学说，全校大字比赛她曾得第一。汪病了，我去她家看她，我们俩抓起流行歌曲“江姐”，看着简谱唱：“华莹山上莽苍苍哎

哎，千年的松树满山岗唉唉，松涛阵阵响，如海啸啊唉，好一片唉唉，好一片雄伟气象哎哎哎！”这歌儿我们觉得抒情悦耳。有天，汪到我家玩儿，坐在椅子上半天低头不语，又欲言又止。我猜她有什么重要的话对我说，就洗耳恭听。“我爸参加过军统……后来他知道里面黑暗，想退出来……”她是这么信任我，她那么纯洁单纯，却背负着这么沉重的思想包袱。我该怎么安抚她？“咱们一块儿掏茅房吧！”我把梁的高招传授给她，她欣然接受，从此，我们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份子。后来我的朋友牟志京一度荣幸地成为汪的男友，他对汪可以说终身难忘，但“想起这简直不可忍受。”

班里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还有位叫筠的同学父亲也是右派，筠却看不起梁，在班里公开说：“她爸爸原来是干嘛的？我爸爸原来是干嘛的？”原来筠的爸爸本是革命干部，不幸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们班40名学生，陆陆续续有转走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梁立明，还有杨瑛瑛和郑德炫。杨和郑是军人孩子，杨梳着两条黑黑粗粗的长辫子，方脸庞，脸色红红的。人很和气。郑个子偏高，脸和身体都特别瘦，跑步特别快，像飞一样。她的父亲原是国民党的兵，被共产党军队收编的。文革开始她从外地给班里同学来信，说自己为了放下出身的思想包袱，在学习原北京市委编写的有关阶级路线的材料。二涛好心地说“让她别学了吧！”因为北京市委已经都被打倒了。高滨滨和陈静静是一块儿转过来的。陈的父亲是将军，文革中去世。有人说陈后来去广州，嫁了一个师长。高是高岗的女儿，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开会斗争她，大部分同学才知道她的身份。还有郭栖霞，也是转来的，她爸是副部长。看那陈静静，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孩子，婀娜多姿，爱好舞蹈。班主任杜梦鱼跑到人家去家访，非说陈静静脑子里缺根阶级斗争的弦。以至于文革即将开始时，班里一位名叫伍正怡的同学得了肺癌，同学们都去探望她，陈却说：“别忘了让她和她家划清界线。”伍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伍正怡不久离世。杜老师很走运，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说她和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照过像，得了个杜摸鱼的绰号，没受罪。她继续家访，1967年下半年解放军进校，她跑到我家跟我妈妈谈话，说我所以参加“中学文革报”的活动是因为在入团问题上受了压，以我的表现，

（主要指跟着梁掏茅房）早入了，可有人说再考验考验。妈妈说我已改邪归正，天天去上学了。杜老师看着我，摇着头：“陶洛诵，你这就不对了……”我早厌恶了学校那一套，天天和遇罗文呆在一起，看谎言被戳穿，感到很难为情。

从1964年9月份开学，到1965年，宿舍楼盖好了，我搬到学校住，每间宿舍有四个床位，每月交2·5元住宿费。早上我六点半起床绕着校外围墙跑三圈儿，到校食堂吃早点。馒头，米粥，咸菜随便吃。到教室上早自习。我当时还有个俄语课代表的职务，领着大家读俄语，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基筛。在俄文里是安静的意思。自习课喧闹四起之时，我喜欢用俄语说“安静，安静，同学们！”教我们俄语课的是王文老师，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老师进来时，我们全体起立，穿着米黄色长大衣的王老师用俄语说：“早上好，姑娘们。”一句简单的问候又引起某人的不满，难道不应该叫姑娘，王老师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是姑娘是什么？难道让我叫你们小伙子吗？”

我们当时姑娘的特征确实不多。扔手榴弹，拼刺刀是我们日常操练的项目。手榴弹是仿真的，木把铁头，有些重量。枪是木制的，文革中，成为红卫兵打老师的工具。

有天早上，我和几个同学到河边练扔弹，不小心，把弹扔河里了。河水不太深，天气却很凉，我们不知所措，把手榴弹留在河里回学校了。第二天，手榴弹完璧归赵，附带信一封。“我们当时在旁边没有帮忙，回校后团支部书记批评了我们……”原来是邻校35中几个男孩写来的，他们从河里捞出手榴弹给我们送了回来。可我们当时一点儿都没注意到他们。

我在小学时代倒有些对男孩爱的体验，我爱过一个叫姚燕光的帅气的男孩。初中高中进的都是女校，一是没机会，二是终日忙学习忙革命。在高一政治课上，政治老师杨震在总结学生暴露思想时提到有人想结婚成立小家庭，杨老师皱眉批判道：“你还没到这个年龄，想这些干什么？”大部分同学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思想。文革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是杨和几个高干子弟贴的，后来被红卫兵打，我听二涛说“打得像猴子一样地跳。”杜梦鱼老师告诉我，一个红卫兵还把自己的弟弟带过来打杨震。

唯一一次提到男女朋友的名称是我们班排练一个话剧，让我演一个叫林育生的男青年，高江宁演我的女朋友。林是娇生惯养的少爷。当我被分派到这个角色时，马恬拍着手大笑道：“像极了！像极了！”我感到好生奇怪，我在马恬心中就是这形象？

狂热的政治氛围，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刻苦锻炼身体，孜孜不倦地学习。这种紧张繁忙的生活在1966年6月彻底结束了。

五月份时，发生了件匪夷所思的事，举校沸腾，许多同学神秘地来去，手里握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我问二涛发生什么事？二涛指着杂志封面上的画，低声说：“看出什么来了吗？”画上是粗胳膊粗腿的农村女青年。我摇头什么也没看出来。二涛像导师启发我：“看那些草！”我翻来覆去地看，还是摇头。“像不像是一条标语？”二涛看我愚蠢，压低声音说：“是‘蒋介石万岁’。”“我怎么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啊！”二涛深深地叹口气：“要不怎么说咱们的阶级觉悟差，警惕性不高呢。咱们哪儿能够看出来，这是×××的爸爸，一位老革命干部看出来的！”这事好折腾了一阵，后来杂志出来证明作者是个政治上可靠的年轻人，才算平息这场风波。

这种无中生有，草木皆兵，歇斯底里的紧张，预示着席卷全中国的暴风雨的来临。

这场共产党上层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斗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开始了。

我最后一堂上的是物理课。女物理老师三十多岁，烫着过耳的长发。她讲了几句光学，苦笑着说：“我讲不下去了，你们和我也一样吧？发生的是怎么回事？”教室外面乱轰轰的，因为操场上出现一张大字报。是教政治的老师杨震领着几个高干子弟写的，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大意是说他们不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云云。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想的是考大学，报考什么专业。离高二年级期末考试不远，暑假过完就是高三了。我恋恋不舍地看着物理老师夹着她的讲义离去。我没想到这居然是我的最后一课。我再拿起课本读书是十四年后的事情了。

（作者简介：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因反对文革坐过几年牢，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现居悉尼。）

□ 原载《北京之春》2016年5月号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四）

• 吴中杰 •

（上接 1909d）

## ▲ 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但红卫兵与张春桥的矛盾并没有缓和。有压迫，必有反抗；压得愈紧，反弹的力量也愈大。反“逆流”反得太厉害了，积压的怨愤也就更多，并不是牺牲一个郭仁杰所能消解得了的。

本来，群众的反张情绪是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硬压下去的，如果张春桥聪明一点，适可而止，局面也许还可以稳定得住，无奈他是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人，对于反对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一整再整，整个没完没了。表面上张春桥的威信愈来愈高，人人谈“炮打”而变色，但实际上危机四伏，人们背地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反张情绪有增无减。所以，无论后来的触发剂是什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迟早要爆发的，这其实是张春桥自己造成的恶果。

还在第一次“炮打”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复旦就有人在大字报中借用鲁迅的话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年之后，这句话应验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发生了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主战场仍在复旦大学。

不过第二次炮打，远比第一次炮打的情况来得复杂。第一次炮打失败之后，张春桥们扬言要抓黑后台，其实那时倒并无什么人在幕后指使或煽动，完全是在新的权力分配的背景下，怀疑一切的思潮在作怪。而第二次炮打则不同了，明显有上层的线通下来，而详情细节一直没有披露，至今还是个谜。

但风源来自北京是肯定的。据我所知，有三条线路通下来：

一条是经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通到《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朱锡琪那里。《文汇报》北办主任艾玲是个通天人物，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曾为江青、张春桥搜集过许多情报，后来又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她的丈夫又是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当时就听说，艾玲用保密电话给朱锡琪通了消息，朱锡琪召集《文汇报》核心组成员开秘密会议，大家宣誓决定炮打张春桥。于是他们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写出《十个为什么》传单，用大字印出，广为散发和张贴。其内容大致是说：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会的报道中，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虽然没有点名，但矛头直指张春桥。最后提的口号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区别于过去所提的“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另一条线是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通到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队”。二军大当时分为“红旗”、“红纵”两派，“红纵”在北京要打倒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上海则支持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反党派，支持上海夺权，因而参加上海市革会的活动，而“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在上海却受到张春桥的排挤。到得4月初，“红旗”却忽然活跃起来了，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的名义，到处刷大标语，如“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等等。杨、余、傅是指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3月份刚刚被打倒，北京提出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上海一些敏感人士认为这个黑后台就是指张春桥。

还有一条线，是由《人民日报》记者通到复旦红卫兵组织。4月初，《人民日报》派了两个记者到上海，都是复旦大学提前毕业的学生，一个原属红革会，一个原属红三司。原属红三司的记者是“过河卒”小组成员，与我关系很好，他到上海后先来找我，告以陈伯达到《人民日报》指示工作时，说了一些不利于张春桥的话，这些话当然是暗示性的，但大家都听得出来，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当时领导人的一种说话艺术。既豁出了翎子，又不落言筌，万一事情不成，别人也无法追究他的责任，他可以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当时的“革命群众”也锻炼得很善于察颜观色，领会言外之音、字外之义。上面翎子一出，下面闻风而动，北京反张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我问他此次到上海有什么具体任务，他说没有明确指示，只是要他们了解基层情况，组点稿子。我立即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派他们来向上海两大红卫兵组织传递信息的，只是领导上不肯明说罢了。北京这股反张热流，必然要南下上海，而且指日可待，不会太久。我们必须赶快拿定主意，作好准备。

我们在“文革”开始以来将近两年的经历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深感自己不过是供大人物驱使的喽啰。大人物在云端里指挥，小人物在地面上大战，打得汗流浹背，头破血流，自以为英雄，其实不过是傀儡。斗赢了，无非是为上面大人物的升迁清除障碍，开辟道路，小人物除了受几句夸赞之外，得不到什么实惠；斗败了，却就是反革命的罪名，身败名裂，而大人物则依然无恙，双方仍皮笑肉不笑地握手言欢。

既然已经悟到这一点，当然就没有劲头再来做傀儡了。我们决定这回要做个看客，只看看热闹不再卷入即将掀起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热潮。次日，约“过河卒”成员在共青苗圃碰头，我将这层意思说了，大家都很赞成。我们还特别叮嘱安文江，要他稳住阵脚，切不可轻举妄动。安文江是红三司司令，在当时是个风云人物，这么大的事体，别人肯定要找他，他又好激动，一激动起来就冲到前面去了。所以要想不卷入，先得把他稳住。

果然，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热潮很快就形成了。4月10日，二军大红旗造反队的大标语就刷到复旦校园里来了。但他们始终只刷些暗示性的标语，既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表现得神秘兮兮的。但愈表现得神秘，愈能刺激人们的想像力。关心“文革”动态的人都知道二军大“红旗”与邱会作的关系，也知道邱会作是林彪的亲信。那么，二军大“红旗”出来反张，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态度呢？如果林彪、陈伯达都在反张，那么，张春桥不是倒定了吗？

于是，复旦红卫兵也贴出了大字报。虽然由于第一次炮打失败的教训，使得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但是愤火积压已久，有了适当的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虽然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张春桥的。这时火上浇油的是，《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十个为什么》的出现。红卫兵消息灵通，知道他们有通天人物。在分析各种动态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次反张之风，是从中央刮下来的，打倒张春桥的时机已到，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4月12日早晨，当人们从宿舍区走向复旦校门时，就看见围墙上有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满世界了，而且还不断地在增加。复旦的红卫兵们怀着深仇大恨，全面出动，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主战场当然仍在复旦，市民们纷纷涌向复旦园。到得10点钟左右，复旦园的几条要道便挤得难以行走了，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不过，胡守钧一派这次倒没有参加炮打。因为这时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复旦，在这之前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将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隔离起来了。“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突击队乘乱冲进隔离室将他们的司令周谷声抢走，胡守钧也走出隔离室，宣布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消息，更给节日的人群增加了欢乐气氛。

“过河卒”和安文江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成为人们追踪对象。有些人向我们探听消息，有些人要我们参加炮打。我们还是抱着老主意：做个看客。但是树大招风，安司令是上海滩上的名人，“过河卒”是有名的战斗小组，在这样大事件面前，要回避也不容易。这时，二军大《红旗》已经派人来找安文江了，名曰访问，实则煽动。我们怕安文江头脑发热，就带着他出去躲避。先是全组集中到我家，那时我家住在淞庄，离校本部很近，马上就有人找到我家来了，我们赶快转移到和平公园，在那边一直呆到傍晚。等我们回校时，第二次炮打事件已经结束。军宣队原来一直旁观不表态，他们的负责人方耀华以微笑来回答别人的询问，弄得别人更加怀疑，这时却出来传达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于是，校园里又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与我们上午离开时那番热烈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人们心中的疑团并未消散。李作鹏只是个海军政委，并非文革小组成员，当时也还不是中央大员，为什么要他出来表态呢？而且与上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相比，态度也并不强硬，有些话还说得非常含糊。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李作鹏是林彪的亲信，林彪为什么那么快就转变态度？但这一切都无法深究。反正大家都明确一点：第二次炮打又失败了，等着挨整吧！

不过这一次倒没有再搞“反逆流”。当然不是李作鹏说了“不要搞反击”就能起作用的，想来另有原因。近来看了一本“文革”回忆录，才知道还是毛泽东特地把张春桥找到北京，下的指示：“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但张春桥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他表面上虽然也只好说“炮打”的账不要算了，其实，在内心里对这些炮打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只是需要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不久就来了，那就是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

（未完待续）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